

一

王好为是我国著名的女导演,曾执导过《瞧这一家子》《潜网》《夕照街》《迷人的乐队》等影片,还和铁凝合作拍摄过《村路带我回家》《哦,香雪》。她的电影关注现实题材,又有着女性的细腻和诗意,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。她很喜欢孙犁的作品,一直想拍《荷花淀》,先后找了四五个人写剧本,但都不满意,觉得没有写出那种诗意的东西。转眼到了1994年下半年,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,她还是想把《荷花淀》搬上银幕。铁凝向她建议,不妨找汪曾祺改编剧本。

孙犁和汪曾祺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。孙犁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,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系,被称作“革命时代的士大夫”。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,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却有颇多相近之处,他们都是文体大家,都在打通小说、散文和诗歌方面,作出了不懈努力。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抒情意味,都把描写风景美、人情美和人性美,作为自己的文学追求。

汪曾祺不仅是著名作家,还是北京京剧剧本的编剧,是一位戏剧创作方面的行家里手。他创作的京剧剧本主要有《范进中举》《雪花飘》《裘盛戎》,还有抒情戏剧《小翠》,戏剧歌舞剧《大劈棺》,而其中最著名且最为人津津乐道的,当然是根据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,与杨毓民等人合作创作的京剧剧本《沙家浜》。因此,若要改编孙犁的作品,汪曾祺是十分理想的人选。

王好为并不认识汪曾祺,先是电话联系,自报家门,询问他对改编孙犁的小说是否感兴趣。汪曾祺说,可以谈谈。于是,王好为登门拜访。在漫谈中,两人相互探讨,发现彼此的艺术趣味和创作理念十分吻合。汪曾祺表示,关于改编之事,要等他看完孙犁的作品后再做决定。

对于孙犁,汪曾祺一直十分敬仰,他曾表示: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鲁迅,沈从文,孙犁三人。对于汪曾祺的创作,孙犁很早就予以关注。1984年4月,孙犁在《小说杂谈》一文中,曾对一些文学作品予以点评,第一小节点评的是莫言发表在《莲池》上的《民间音乐》,第五小节点评的便是汪曾祺的《故里三陈》,直言“我很喜欢这样的小说,省时省力,而得到的享受,得到的东西并不少”。他认为,汪曾祺的小说是中国的传统写法,“它好像是纪事,其实是小说”,并将自己的小说(《芸斋小说》)与之进行比较:“我晚年所作小说,多用真人真事,真见闻,真感情。平铺直叙,从无意编故事,造情节。但我这种小说,却是纪事,不是小说。强加小说之名,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。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。”其实,汪曾祺的小说也大都具有真实原型,虚构的成分也不多。他们的小说都继承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精髓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两个月后,王好为再次登门拜访。汪曾祺告诉她,电影的片名已经想好,就叫《炮火中的荷花》,并初步选定孙犁的六七篇小说进行改编,力求凸显残酷战争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。王好为十分兴奋,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

真正进入到改编阶段,汪曾祺才深切感受到,孙犁那种散文化的诗意小说,改编起来难度有多大。汪曾祺自己的作品也没多少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,他亦不善此道。1954年,他创作了京剧剧本《范进中举》,一次酒后,老舍和他开玩笑,说他的剧本“没戏”,即缺少戏剧性,而他和孙犁的文学风格相近,好处是容易入手,难处是结构正作不易。

正在这时,汪曾祺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,饭吃得很少,笔也懒得拿,整天枯坐在沙发上,颇有力不从心之感。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,便给王好为打电话说:“不行了,写不了。”他说,自己没有战斗生活,对冀中地区的话语不大熟悉,对如何结构电影剧本也没有经验,改不下去。放下电话,王好为立刻登门来见他。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说,“无奈王好为很会做工作,一再说他们想搞一个与众不同的战争题材的电影,孙犁的小说很切合他们的设想,而孙犁的作品只有让爸爸改编才能不失其韵味。让她这么一谈,好像爸爸不动笔,就无法把孙犁的精品搬上银幕了。这个责任非同小可。于是,爸爸只好打起精神,勉为其难了……看到他整日冥思苦想、茶饭不香的样子,我们都劝他不要写了,年纪那么大,身体又不好,没本钱玩命了。爸爸也几次都说过洗手不干,但是碍于情面,最后还是咬牙把剧本写成了。”

1995年年初,汪曾祺因肝病和小肠疝气住院,王好为到医院看望,她对《炮火中的荷花》剧本十分赞赏,认为写得“太精彩了,太富有诗意了”,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。当时,汪曾祺正准备做手术(后来实施),无法动笔。王好为征得他的同意,自己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和内容上的增删,修改后的剧本发表在《电影创作》1995年第4期上。在中宣部文艺局、广电部电影局的推动下,河北电影制片厂、中影公司影视制片部准备联合拍摄这部影片,后由于资金问题难以解决,拍摄计划流产。

二

其实,最早改编《荷花淀》等作品的正是孙犁自己。1949年,在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的鼓动下,他曾写作过一个电影脚本。抗日战争时期,孙犁和凌子风相识于冀中,又一同从延安返回张家口,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进城后,凌子风想拍一个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电影,孙犁正值青年,乐于尝试新鲜事物,便把自己的一些小说和散文重新编排一下,搞出了一个电影脚本。

过了很长时间,凌子风写信告诉他,电影脚本送给茅盾审阅,同意了,转到周扬手里,否定了,说是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居多,还是另拍一部小说为好。孙犁不同意这一意见,心中不平,却也没有申辩,只是把脚本中新写的部分摘出来,改成短篇小说《采蒲台》,拿出来发表了,从此不再“触电”。至于那个电影脚本,先是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,发还后,被孙犁生了炉火。现在,人们只能从《采蒲台》中略窥其貌。

汪曾祺创作的《炮火中的荷花》共八小节,把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《光荣》《山地回忆》《吴召儿》《嘱咐》等几个短篇小说融为一体,创作出了一部带有浓厚抒情风格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第一小节十分唯美:白洋淀上缓缓展开花瓣般的粉红色荷花,满眼随波荡漾的荷叶、飞地在绿荷丛中的小船,耄耋的老渔翁那双尖锐明亮的眼睛,还有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……这一切,都呈现着白洋淀水乡特有的风景美和人民抗日战争的精神风貌。

第二小节是对《荷花淀》的改写。水生参加了区游击队,与媳妇日夜话别;水生媳妇和村里几位青年妇女追寻自己的丈夫,在大堤遇险,并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伏击日本大船的战斗场面。回村后,她们苦练射击,驾驶着小船和冰床,出入芦苇荡,配合游击队打击日本鬼子。

第三小节根据《芦花荡》改写。月夜的水淀上,那位瘦瘦的老渔翁送两个女孩子——大菱和二菱到芦苇荡中去,中途遇到日本鬼子的小火轮,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去,大菱受伤。第二天中午,老渔翁把正在淀中洗澡的鬼子,引诱到自己布下的鱼钩阵中,鱼钩钩住了鬼子的大腿,老渔翁举起竹篙,砸在敌人的头上。

第四小节摘取了《光荣》的前半部分进行改写。在秀梅的配合下,十几岁的原生卡了鬼子的一支步枪,参加了游击队。他的媳妇小五是 个落后分子,对原生参加游击队心怀不满,秀梅和水生媳妇对她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。

第五小节把《山地回忆》和《吴召儿》糅合在一起改编。一位八路军干部在河边洗脸,和在下游洗菜的女孩子发生了争吵,这个女孩子就是吴召儿。这年冬季,八路军反“扫荡”,那位八路军干部担任了一个游击小组的组长,分配给他的向导就是吴召儿。吴召儿带领游击

小组在大山里辗转游击,和敌人进行战斗。

第六小节改编自《嘱咐》。水生回乡看望妻儿,只住了一宿就要返回部队。凌晨,水生媳妇撑着冰床把丈夫送上了前线。

第七小节是改编者创作的一段过渡性文字。大菱、二菱坐着老渔翁的小船到苇塘去,因为这里的自卫工作搞得 好,区长让她们来学习和取经。

第八小节根据《光荣》的后半部分改编。水生媳妇、吴召儿、双眉还有秀梅,看到刚从娘家回来的小五,便开始做她的工作,告诉她,原生去当兵,为的是保家卫国,是光荣的事。小五反驳她们:“光荣值几个钱!”她执意要和原生离婚。小五离开婆家后,秀梅经常到原生家去做活儿,照顾原生的父母。原生在前线立了大功,骑着大马荣归乡里,村里召开了庆功大会,秀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。

剧本的结尾展现了原生和秀梅这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的爱情。画面闪回到秀梅和原生卡枪的场面。奔跑中,秀梅的头巾丢了,他们跑回去找那块头巾。找到的头巾随风飘起来,变成了展翅飞翔的白鹭……

三

汪曾祺创作的这个电影文学剧本,较好地反映了孙犁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追求,是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。但是,由于创作时间仓促,加之汪曾祺青少年时代主要是生活在南方,对白洋淀地区和晋察冀的抗日战争,包括地理环境、风土人情了解不深,在创作上也就难免存在一些瑕疵。比如,第五小节的八路军反“扫荡”,吴召儿带领以“干部”为组长的游击小组转战山地,与白洋淀水乡的抗日斗争缺乏内在联系,本来是水乡之笔,一下子写到山里去了。这一节,如果让从白洋淀走出的水生替代那位八路军干部,让他转战到晋察冀山区,或许更加合情合理,从人物塑造来讲,能充分彰显水生这位青年农民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历程,而从剧情来讲,也与第六小节的水生返乡之旅形成一个完整链条。

另外,为了增加这个电影脚本的容量,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把孙犁创作于1942年8月的短篇小说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融入进去,与《芦花荡》进行衔接。

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描写了钱智修和妻子参加抗战的故事。钱智修和“我”是好友,喜欢拉南胡,和一位善于吹竹箫的姑娘结婚,后来生下了大菱和二菱两个女儿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钱智修参加了游击队,在一次战斗中牺牲。妻子把大菱和南胡交给“我”照顾,自己带着二菱和竹箫参加了抗战。一段时间后,她要到延安去,又把二菱和竹箫送来。过了一段时间,“我”要到别处去工作,只好把两个孩子送回她们的姥爷家。在“五一 大扫荡”中,“我”来到了白洋淀,从摆渡的老艄公嘴里,听到了两个女孩子在穿越白洋淀时,被敌人射杀的故事。“我”不能确定那两个女孩子就是大菱和二菱。在那满天芦苇形成的巨大帐幕下,“我”仿佛看见两个穿军装的女孩子走出来,一个拉南胡,一个吹竹箫……

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是孙犁第一篇描写白洋淀地区抗日战争的短篇小说,作品发表后,一些同志认为有些“伤感”,孙犁便把这篇作品“放”开。在延安,他利用这篇小说的素材创作了《芦花荡》,使之成为《荷花淀》的姊妹篇。

1962年,《爹娘留下琴和箫》被冉淮南发现,抄录下来送给孙犁,几经周折,1980年在《(新港)》第二期重新发表,并易题为《琴和箫》。阅读这篇旧作,孙犁觉得没有什么严重的“伤感”问题,同时觉得作品所流露的情感很是单纯,它所融入的激情,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,反映了当时迫切的抗日需求。

在《炮火中的荷花》中嵌入《琴和箫》的内容,通过创造性转化,延伸出爱国知识青年参加抗战这条主线,使之与白洋淀地区的青年农民,尤其是青年妇女参加抗战这条主线并行,也是一种更好的改编路径。这些青年男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行为,以及爱情与家庭所汇成的命运交响曲,会赋予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更加曲折的故事情节,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四八期

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,他走村串户,宣传抗日救亡思想,壮大革命武装力量。

在家乡的北部,有一条通往外界的交通线路,也是他秘密传送情报的必经之路。为了保障这条线路的畅通,附近常有抗日游击队巡查。在这条线路的东侧有一座日本鬼子的炮楼,为了攻克这座炮楼,抗日游击队曾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日伪军居高临下,日夜把守。夜晚,用探照灯也能照射百米之远,即使一只野兔出没,也会被他们察觉。十多米高的炮楼,外围有一道两米多深的壕沟,里面又加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,防守严密,没有重型武器,想攻克确实困难。游击队曾几次进攻,都以失败告终。

晨曦洒在谷场上

刘秀玲

他与抗日自卫队成员多次研究攻打策略,终于想出一个可行的计划。

他与一名自卫队人员,伪装成小商贩到镇集上卖一些烟叶和谷物,以便打探炮楼内驻守士兵的人数及部署防卫情况。经过多日打探、观察,他们了解到炮楼内有二十多个伪军把守,而每隔几日,都会有几个伪军到集上去抢夺粮食、蔬菜等物品。卖东西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,只好忍气吞声,眼看着他们明枪暗夺。

不几日,他们便摸清了炮楼的结构、守卫情况和换岗规律,根据实际情况几经研究,制定出周密的计划。由于人员、枪支弹药有限,他们采取了安全性高、伤亡小、隐蔽性强的攻占方案——挖掘地道接近炮楼,实施突袭。

白天,他将黑板挂在院里的树上,给孩子们上课。自卫队人员白天在田地里劳作。等到夜深人静时,他与自卫队的三十几个人扛着锄头、铁锹等工具悄悄去挖地道。为了避免被日本鬼子和伪军发现,他们时刻保持警惕,轻挖轻运,将挖出的新土抬到河边倒进河里,不留下一任何痕迹。经过一个多月 的秘密挖掘,二百多米长的地道终于在有惊无险的情况下完成。

在一个深夜,他们采取了行动。利用地道的掩护,他们接近炮楼,将炸药包固定在吊桥底部,引爆炸药摧毁了吊桥。吊桥被炸后,结构断裂,坠落时与地面产生的撞击声,惊动了驻守的伪军,他们进行了猛烈的反击。因双方武器相差悬殊,

七月初的一个早上,我刚到办公室,就看见它的中心又抽出几根细长的花茎,每根茎的顶端都顶着个小小的花苞,像一颗颗裹着绿衣的珍珠。“没想到这野草还能开花,倒是有些稀奇。”没想到,接下来的几天,花苞一天天鼓起来,绿衣渐渐裂开,露出里面淡淡的鹅黄。直到一个临近周末的早上,我推开办公室的门,一眼就看见它开出了数朵含羞的花。那小小的黄花,每朵都有五片花瓣,像被阳光热吻过的星星,稳稳地挂在花茎顶端,在满室的文件和电脑屏幕间,显得格外鲜亮。那天午休时,好几个同事都围拢过来看这些盛开的小花。有人拿出手机拍照,说要发朋友圈,配文“办公室的意外惊喜”;有人说这花看着让人心里舒服,比花店买的玫瑰花还要耐看。

有一天晚上,市里有重要活动,要求我们24小时在岗值班,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,月光透过玻璃,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揉着发酸的肩膀,抬头瞥见那株野花,叶片和花朵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,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老家的菜园。那时每到春天,菜园的角落落

总会不经意地冒出成片不知名的野花。父亲从来不会锄掉它们,他说这些野花让人感到一股子韧劲,像极了村里朴实的父老乡亲。陪父亲打理菜园的日子,我总爱蹲在地头路边,看着黄色的小花在风里摇摆,憨憨的,煞是可爱。有时兴致来了,我会趁父亲不注意,拔取一束野花窃为己有,插在书包的侧面,转身蹦跳着跑走了。后来上大学离开老家,我再也没见过那样成片 的野花,没想到,如今在办公室的花盆里,竟重逢了这样久远的绿意。

这是一场意外的相遇,更是一份难得的珍惜,就是这株不知名的野花在我最忙碌、最疲惫的时候,给我带来了“一抹新绿,一阵清香,让我在钢筋水泥的办公室里,也能近距离触摸到生命万物的鲜活与力量。

时间推移,如今这株野花的叶片依旧翠绿,只是花茎有些枯萎了,明明不缺水、不缺营养啊,为何会这样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咨询一位花匠,他说让我继续将其放到窗户外边养着试一试。按照花匠说的,我把它端到外边的窗台上,奇迹竟然出现了,一天时间不到,风一吹,太阳一晒,它的叶片不但更油绿了,花茎又重新挺直起来。没几天,花苞凋谢,开始孕育果实。

仔细想来,它本来自于大自然,想必已经与大自然同频,人为地囿于温室,只能让它失去本性,失去抗争能力。它也许只是误打误撞与我结缘,它不属于我,它应该有它自己的世界。

那以后的日子里,每天工作累了,我就会俯身去窗外观看它,看看那些舒展的叶片,想想它从一粒不知名的种子到开花、结果的过程,内心就会莫名地平静下来。其实我们每个平凡的人,也不像一株野花吗?在陌生的城市里,在繁忙的工作中,努力地扎根、生长,或许会遇到风雨,或许会经历挫折,但只要不放弃,把风雨和挫折当作机遇,视为不可多得的历练,就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,闯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。

站在窗前,我想,也许有一天,它的一粒种子真的能乘着思念的风,越过山川河流,散落在我曾经学习、工作过的土地上,也像现在这样,悄悄扎根、静静发芽,长成一片片小小的绿意。那绿意里深藏着我对每一寸故土的感恩,也深藏着我对每一段时光的眷恋。于是在这秋韵浓浓的时节,我仍然为它每天开着那扇朝北的窗,助力它回到生命真正奔流的地方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将继续守着这株不知名的野花,守着这份意外的温暖与力量,在平凡的日子里,活出精彩的模样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为避免遭受重创和防止地道口暴露,他们选择掩护伤员迅速撤离。

这次突袭虽未成功,但将吊桥炸毁,切断炮楼内的伪军与外部联系的通道,给后续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第二天晌午,十几个日本鬼子突然冲进,挨家挨户搜查。昨夜突袭炮楼的人员,弄得鸡飞狗跳,并要求每户不准留一人,就连身体不便的老人和几个月大的孩子都要全部到谷场上集合。

他刚刚下地道给受伤的自卫队人员送饭回来,正准备吃饭,“咣”的一声,院门被踢开,几个日本鬼子闯进院子。妻紧张地朝屋内的衣柜下面望了望。他看了妻一眼,示意她不要惊慌。院里、屋内被弄得叮当乱响,鬼子们搜了半天,也没有搜到人,气急败坏地离开了。

烈日炎炎,谷场上站满了乡亲。他远远地看到,父母牵着女儿的手,也站在人群中。

鬼子在前面架起两挺机关枪,枪口对着人群。一个汉奸高声喊道:“你们都听好了!谁是共产党、马猴子(抗日自卫队人员),赶快站出来!”

人群中没有人说话。

这时候,老村长站了出来,毫不畏惧地说:“我是村长,我用脑袋担保,我们村没有共产党,没有马猴子。”话音刚落,就听村民中有几个人一起高声喊道:“我们村没有共产党!没有马猴子!”

鬼子头目气势汹汹地冲着人群吼叫,汉奸翻译道:“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共产党和马猴子,我们就炮轰整个村子!”

军犬朝着人群狂吠,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。炎炎烈日下,有几个老人坚持不住倒在地上,人群中有些骚动。鬼子头目举起手枪,朝天空开了两枪,人群安静下来。

鬼子头目朝一个鬼子使了个眼色,只见那个鬼子立即跑到人群中,抓出一个男子问:“共产党和自卫队的人,被你们藏到哪里去了?”

“我说了——没有!”

鬼子头目掏出手枪,朝男子的胸部开了一枪。人群中发出惊叫声。

男子重重地趴在地上,鲜血从他的胸部流了出来,瞬间漫开。

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!”只见他从人群中走了出来,转身望了一眼身后的乡亲们,对鬼子说,“他们都是种地的老百姓,什么都不知道,放他们回家。”

鬼子头目一摆手,汉奸立马向人群喊道:“解散!”他被鬼子押走了。望着他的背影,妻使劲地咬着嘴唇,泪水夺眶而出。女儿张开口要喊爸爸,被奶奶用颤抖的手拼命地捂住。

乡亲们慢慢散去,谷场上安静下来。次日清晨,太阳徐徐升起,几名自卫队人员在谷场上发现了他的尸体,他身下的野花和小草,已被鲜血染红……

炮火中的荷花

汪曾祺与孙犁的文字缘

范英科

